

两个有点偏执的人

封志良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通讯,讲的是一个追梦“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引起了一些关注。其中有主人公跪在我国数学家刘建亚房间门口,请求审阅其论文的细节。可是,文章发表后,当事人却矢口否认,说我诽谤他。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口无心。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在常宁市委大院,我又遇到了他。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且显得十分疲惫。我问他:“吃过早饭没有?”他说:“没有。”于是,我请他在食堂吃了一顿早餐,粉、面包、鸡蛋,都要了一些。看他的情形,肯定是已有一两天没有吃过饭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为了一个偏执的梦想,落魄至此,实在让人有些唏嘘。他问我:“你们单位的某领导还在吗?我等下去找你们。”他提到的某领导,曾经对他很同情,每回来找,都会从自己身上掏出五十、一百给他。我说:“早几年已到某乡镇当书记了,你不要来了。”

我跟他说:“你的论文已被证实是错误的了,《山东大学理学学报》也把你的文章在电子版上撤掉了。刘建亚还因为你的事情,受到了一些非议。你不要再去白白耗费自己的精力和金钱了,回家带孙子吧!”他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并没有像以前我看到一个北师大硕士写他的那篇文章中那样“很激动,眼泪哗哗地往下掉”。他当时表情有些失落,显得非常木讷,他接着说:“陈景润的那个论文也有很多错误,但也得到了全国的公认。”看来,他依然不能承认失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毕竟,30年的付出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谁都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

此后两天,他又到过我的单位两次找我。一个为了自己梦想,把包括孩子和家庭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弃的人,谁又能劝得动他呢?我想。

这个人痴迷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而我要说的另一个人痴迷的则是诗歌。他痴迷诗歌已经到了什么事情都不顾的程度,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中始终不愿走出来。他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可能已成年了吧。他曾告诉我,早些年他女儿的学费都是他在广东打工的前妻在负责。他的女人对他早已死心,在很多年前就已与他离了婚。

过去很多年,这个人没有在他那几亩土地上种庄稼,却一直把自己关在心灵的田野中种诗歌。他每有新作,都会跑到县城来,找人看看。他听说我在诗歌上有点虚名,又加之在宣传部门工作,几年前来到我的办公室。起初,他写的是些藏头诗,也就是那种五字或七字一句的打油诗,既无个人感触,也无语言意味。我跟他说:“我是写新诗的,对旧体诗不太懂。但凭我的直觉,你的诗很平常,写下去没有什么希望,甚至你连基本的格律都不熟,不如老老实实在干点别的事情赚点钱,把女儿教育好。”他没有说话,自己搭车回家了。

有一次,在我办公室,我看到他寄稿用的是早些年那种快件的方式,一篇短短的诗歌稿子,打印和邮寄费就要耗费十多块。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说:“在这些报刊上发东西是很难的,你这样的文字水平,这样不计成本地去快递,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依然不听,依然乐此不疲。

出于同情,在我编辑的县级报纸的副刊上发了他两首诗。这两首诗都是新诗,还有点意境,比他的旧体诗要好一些。后来他得更勤快了。以前是半年来一次县城,此后,他差不多每个季度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要带些新作请我指导,但我每次都给他泼冷水。有一天,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已在兰江的一个鞋厂找了份事做,现在每月有两千块钱了。我真为他感到高兴。但不知为何,没做多久,他又回去了。不知是不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回到家中,他没有其它什么事干,责任田也流转出去了,更不晓得打牌。于是,他又开始鼓捣起自己的诗歌来。

他寄出的诗歌终于有了回音。有一天,他非常激动,拿着一本刊物来找我。我一看,是一本不发稿费的民间刊物,但他却如获至宝,脸上呈现的喜悦溢于言表。那次,他跟我提出想加入作协,不知符不符合条件。其实,这个事情,此前,他跟我说过多次,但我每回都跟他解释:入不入作协,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他依旧很执着。于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多年前的空白的县级作协会员证,帮他填上了名字,满足了他的要求。我想,再怎么打击,也必定是于事无补,倒不如成全,了却他一桩心事。

那年春节,我在乡下接到了写诗的这个人借别人的手机打来的电话。他跟我拜年,我祝他健康快乐。我劝他写点东西可以,但不要再往那些大刊物投稿了,把那有限的困难生活补贴白白浪费在邮资上,实在有点不划算。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他现在可好。

曾经我一直认为,一个人长年累月地坚持做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如果他们还能在其中体验到那种痴迷带来的快乐,那就更加让人羡慕和敬佩了。但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想法: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何必非要往死胡同里钻呢?当初,他们如果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及时放弃,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将是另一番景象。



五十年后,向老师鞠躬致歉

尹文策

今年10月22日,我们衡南县立四中六六至六八老三届同学聚会一周年的日子。

五十年,人生长河不算短,历史长河不算长,花开花谢五十次,草荣草枯五十春。五年的校园生活,五十年的思念绵绵,五年的学友共窗一去不回,五十年后回首仍是永远的同学。

我进入设在南湖公园一家乐的会场时,第一个握手的就是龙盛义同学。当年,他与我共了三年油灯的一个学习小组的,在食堂里,八个同学共一张饭桌,我俩也被编入一桌,真正是同解一道数学题,同吃一钵南瓜汤的同学。更加重要的是,他对我强壮身体的事特别关心和帮助,他劝我洗冷水浴,说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方法。时近中秋时节,天气渐渐凉爽,一次我们去洗澡时,他一盆冷水从我背后泼来。我打了一个寒颤,反过脸来,瞪眼看着他。他却乐呵呵地说道,不是故意的,不要认真!我无奈,只好洗起冷水澡来。后来,我还真的逐渐适应起来。他的口头禅是:身体好比学习好还好。

我们两双手紧紧地握着,似乎有一种幻梦般的感觉,面部都是微笑的表现,似乎都在寻找适当的语言表达自己此时激动的心情,几十年后重逢的心情。但谁也没说出来,都在久久凝视着对方,离别时满头黑发被岁月染成了白色,细嫩的额头被风霜刻出了皱纹,脸上满是时间的沧桑。

当年一起晨练时,我们曾说过,假若考不上学校,身体好可去当兵。想当年,青春光芒四射,一腔热血沸腾;想当年也曾寄情蓝天白去,也曾寄情惊涛骇浪……

两人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渐渐松开紧握的双手,相互介绍后才知道他在公务员的位置上退休。

尹同福同学虽然与我不是过从甚密,但在那同学情、真心话使我五十年时间里不曾忘记。

记得在谭子山开花果山时,因修路的事,我与班主任老师争吵起来。他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学生不能跟老师争吵,只能听老师的话,向老师学知识。五十年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极平常、极平凡的话,却有着人生怎样做人的经典含义和哲理。五十年后当两双粗糙而又皱纹的手相握时,我对他有一种亦师亦友的感觉。

欣喜的是,变的是模样,那份师生情、同

学谊始终没变。见面了,我们没有拥抱的场面,但那牵着的手却难得分开。相见时难别亦难,四目对视,没有哪一个涌出泪水,但都看得出大家把泪水往心中咽。在校时的磕磕碰碰,离别后的思思念念,尽在五十年后的握手中。

聚会啦,张张笑脸,声声问候,没有官样官腔,交流时全部是家乡的俗语方言,诉说着别后的坎坎坷坷,介绍着别后的平步青云,长吁短叹时一定是谈论到分别后而今天未参加聚会的同学生活的不顺,声音哽咽时,一定是在感叹某个同学英年早逝,学友一片追思之情。我与龙盛义、尹同福、彭彭发等同学深切地怀念起王方顺同学来。

王方顺同学学习绝没有我们“刻苦”,我们埋头紧张做作业时,他的作业早完成啦。每次考试,无论是单元检测,还是期中期末考试,我们考得满头大汗,额头渗汗,也难得得到80分,他轻轻松松就得了满分。有一次,一道几何习题转了一点弯,我左思右想,草稿子演算了三大张也没解出来,其实就是“角、边、角”的问题,他轻轻一指点就化解我的满团疑云。今天,我们聚会,回忆起他来,无不叹息他的英年早逝。

五十年后的聚会,也能解脱一生耿耿于怀心情的困境。

我们的毕业分别是在特殊时期中。秦声元同学在聚会主旨演讲中惋惜地说道:“老师受辱,批斗乱编,今日回忆,思绪万千,只怪我们当年年少无知……”他代表我们全体同学向老师鞠躬致歉。这是迟到的鞠躬,也是迟到的忏悔。秦声元同学这一鞠躬是历史性的鞠躬,至少帮我还了终生的“债务”。对今天光临我们同学聚会的刘正玉老师,许常胜老师,我和我的同学们深情祝愿两位老师健康长寿。对不在人间的老师,我们只有深深的怀念。我不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我知道老师心中没有我的名字,我的位置,但我还是来到我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的身边,作个自我介绍,心里默默地向老师保证,以后一定要做老师的好学生。

下午在留赠母校的玉石感恩碑前,我们留下合影。昼夜的轮回无可抗拒,黑幕在天边徐徐拉开,同学们手紧握着,无可奈何地又要松开,因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惟愿天佑寿年,同学们再聚会。

市井话本

胡剑英

移 车

银行门前只有几个车位。我告诉新来的保安吴师傅:这是为行里领导留的位子,每天上班你可得早点来守着。

这天,吴师傅不过眯了几分钟,睁眼发现副行长的车位让一辆路虎占据了!绕车察看,都不见电话号码。

“咯何得了噻?”吴师傅急得直搓手,问正在墙角停放电动车的我。在我们印象中,副行长可是个高冷的女人。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向我们走过来,愤愤指着靠边停的副行长的车:“请问这是谁的?我要出去。帮忙移下车好吧。”

吴师傅把自己手机借给中年男子:你打!你打!

高兴之余,我们也疑惑:这开豪车的男子怎么手机也不带身上?且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的。也许有钱人就这样低调、任性吧。

当副行长姗姗下楼移车,惊奇一幕在我们仨眼里拉开——中年男子推出一辆红色电动三轮车!阳光点亮了车灯,像希望昼夜都亮着眼睛。

一个高胖女人上了他的车,嘻笑着将刚买的热乎乎的包子送他嘴里。

“哈哈,这货真沉!出发!”